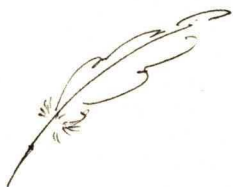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修昔底德集

魏朝勇 熊文驰 ● 主编



[美]格雷纳 (David Grene) ● 著

古希腊政治理论

——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笔下的人的形象

Greek Political Theory

戴智恒 ● 译

华夏出版社

ES

德集

陈明 张其成 主编



古希腊政治理论

——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笔下的人的形象

Greek Political Theory

[美]格雷纳 (David Grene) | 著

戴智恒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希腊政治理论/(美)格雷纳著;戴智恒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 3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Greek Political Theory

ISBN 978-7-5080-6861-9

I. ①古… II. ①格… ②戴… III. ①政治理论—研究—古希腊 IV. ①
D09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5719 号

Greek Political Theory: The Image of Man in Thucydides and Plato
By David Grene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1950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7-4902 号

古希腊政治理论

[美] 格雷纳 著

戴智恒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191 千字

印 张: 8.5

定 价: 3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修昔底德集”出版说明

当我们聆听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正义、公民德性、最佳政制、礼法与自然的讨论时,思绪中往往呈现出那座伟大、静穆而不免令人感到孤寂的城邦,并会在不经意之间把它安放在某个高山之巅或孤岛之上。唯有柏拉图笔下的《蒂迈欧》在讲述那块烟波浩渺的大西岛时,“引入”了越洋而来的敌人,尝试着在战争这样的“运动”中考察城邦,然而,大西岛还只是一个模型,只拥有一个城邦和一个敌人,其“运动”也是一个设计好的样板。类似地,亚里士多德曾专注于考察另一种特别的“运动”——城邦党争,但基本局限于城郭之内;他甚至考察过雅典远古以来的全部党争史,但看不出这种城郭之内的争斗与斯巴达等盟友以及城邦的敌人有什么干系。相比之下,修昔底德则考察了“世界”中几乎所有的城邦,并命令它们全部彻底地“运动”起来,彼此或敌或友,各个求取生存——修昔底德《战争志》沉郁而令人激动,既贴近现实,又探讨了所有政治体的野心、恐惧及历史命运。

今朝看来,修昔底德似乎是在“国际体系”中考察大国的崛起与未来。然而,有别于当今所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是,修昔底德没有把城邦或国家简单地抽象成封闭的政治单元,然后以这些政治单元的外部实力作为变量,按照恐惧与制衡这条“万古不变”的单一原理,“现实地”测算霸权与体系的未来。如果不去观看政治单元内部的“黑洞”,不去探讨具体政治体的城邦民德性、政治领导人的决断与谋略、特定历史时

期的地缘结构、国家财富的增长之道,不去追求国家实力的自变量,怎么可能把握国际政治的历史与未来?

修昔底德《战争志》名曰记叙战史,所贡献的却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客观史学”:他既务求史实准确,又努力编修史实,“选取最有意义的方面予以评说”;如果在他面前存在过一部客观史实,那么他所留下的则是他对这部史实的深思;他的传世瑰宝是自己的思考,而非客观史实。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同时阅读两部大书:那场战争以及政治思想家修昔底德本人。

修昔底德因预期到那段伟大历史的到来而开始着手他的记叙与思考,如今我们似乎又临近另一段伟大历史,从修昔底德那儿获取教益,岂非正当其时?“修昔底德集”以编译《战争志》笺注体汉译本为要,辅以西方学界研究修昔底德的精深之作,以助益于我们把握即将到来的伟大历史。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申组

2010年7月

中译本说明

刘小枫

修昔底德属于我们耳熟却未必知其详的古希腊经典作家。我们知道,在伯罗奔半岛战争期间,修昔底德因一次由他指挥的军事行动失利,被剥夺指挥权,随后遭流放。这倒给了他机会,从交战双方的角度冷静观察事件,思考战争中充分暴露出来的人性的极端表现,从容写下传世不朽之作,细致、生动地记叙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近三十年的战争(公元前431 – 前404年)——正是这场战争彻底动摇了雅典城邦在泛希腊世界的政治地位。修昔底德的纪事开篇第一句是这样的:

雅典公民修昔底德所志之战(ξυνέγραψε τὸν πόλεμον),
乃伯罗奔半岛人与雅典人相互厮杀之战,[战争]爆发即
始笔书,因为他预料此为一场大战,比以往所有战事都
更值一书……动荡(κίνησις)如此之巨,不但发生在希腊
人身上,也发生在相当一部分蛮夷身上,甚至于可以说
波及人类的大多数。(Thukydides, *Historien* I,1)

这段开场白表明,修昔底德的这部战争纪事的书名当译

作《修昔底德所志之战》——古希腊人提到修昔底德的这部书时,就叫做 *Θουκυδίδης ξυνέγραψε* [修昔底德所志]。如今通行的古希腊故书的西文书名大多沿袭拉丁语译法,有时并不贴切,我们翻译古希腊原典如果不动脑筋地跟从现代西人的译法,不仅走样,还容易徒添误解和歧义(柏拉图的《理想国》、普鲁塔克的《论语》就是明显的例子)。我们已经用惯了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个书名丢失的细微含义其实不少。首先,“尼撒”是希腊文“半岛”的音译,雅典城邦的生活感觉倚靠大海,半岛人与雅典人的战争无异于靠陆地为生与靠海洋为生的人族之间的战争。第二,修昔底德强调的是“伯罗奔半岛人与雅典人之战”,重点在于“相互厮杀(*ἐπολέμησαν πρὸς ἀλλήλους*)”,译作《伯罗奔半岛战争史》显得单方面强调伯罗奔半岛,有违修昔底德的本意。第三,修昔底德让自己在记叙中以第三人称现身,称“雅典公民修昔底德所志(*Θουκυδίδης Ἀθηναῖος ξυνέγραψε*)”。动词 *συγγράφειν* [记叙]的字面含义看起来是以汇集整理原始材料的方式记叙历史事件,近似我国古代的所谓“述”而非“作”,或者说相当于我国古代所谓的“编修”。然而,修昔底德的“述”并不隐藏“我”,反倒通过笔下的“他[修昔底德]”让当时的“我”处于逐渐彰显的过程。如果书名本身丢失“修昔底德”之名,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也对不起修昔底德。

古人称修昔底德为 *ὁ συγγραφεὺς* [纪事家],以有别于诗人(*ὁ ποιητής*)荷马。*ὁ συγγραφεὺς* [纪事家]与 *ἱστοριο-γράφος* [史记家]没有差别,但诗人荷马的诗作同样是纪事,因此被称为“史诗”诗人,两者有何区分?诗人荷马的纪事是神话式纪事,而非探究式纪事。如今的 history 源于希罗多德的 *ἱστορία* [探究], history 的原意并非“史”,而是“追根溯源”(*ἱστορεῖν*),从而是具有哲学性质的探究纪事:自然哲人的探

究是希罗多德的 *ἱστορία* [探究] 纪事的基础。修昔底德对自己写这部纪事书的方法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他说,修昔底德记叙这一历史事件不是为了今后人们还会偶尔谈起这场战争,而是要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笔“永久的财富”(*κτῆμα ἐς αἰί*),“让那些想从过去的事件获得某种确实的东西的人借此根据人性(*κατὰ τὸ ἀνθρώπινον*)去预测将来发生的事情”(卷一,22)。对于有别于荷马,修昔底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对于赶超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也信心十足,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纪事是在深入思考战争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这场战争如何改变了人性、人性如何堕落到极点,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纪事家达到了如此哲学深度。既然修昔底德立志通过记叙这场战争探究所有人类战争的性质,这部传世之作的书名最为稳妥的译法恐怕最好莫过于“战争志”。

修昔底德的这部传世之作笔法高超,善于将自己的深邃见识形之于或藏之于笔端,绝非如今实证史学所谓的客观实录一类史书。如果将书名译作“战争史”,难免削弱修昔底德纪事的典范意义——“著书之业,真能独立改制而无依傍者,经籍所志,多不过五六人也”(金松岑,《文学观》),修昔底德无疑属于西方古典文史上“多不过五六人也”之一。用汉语的“志”来对译 *Θουκυδίδης ξυνέγραψε* [修昔底德的记叙] 也许更为恰切,首先,“志”通“結”,作为动词意为“记载、纪事”,作为名词意为“纪事的书”。第二,“志”出于“情”,发为“志向、向慕、目标”,修昔底德记叙的雅典民主政制的 *δημαγωγός* [人民领袖] 挑起的这场战争,恰是某种“情志”或“志向”的表达,所谓“战争志”隐含的意思是战争情志。第三,我国古代文史的“志”还带有政治哲学意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言:“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疏曰,“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杜预注则曰,“为礼

以制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使不过节”——从而,“志”暗含如何节制人情这一重大的政治哲学问题。通过“战争志”,修昔底德正是要探究人的政治情志与节制的关系。

在开场白中,修昔底德把这场战争称为“如此巨大”的“动荡”(κίνησις)。所谓 κίνησις 的原意是“运动”,尤其“运动”过程,由于首先指自然物体的运动——从天体物体的运动到人体的情绪运动,这个语词还包含“运动”规律的含义。但在这里,这个语词的意思明确指的是作为政治大动荡的战争。修昔底德让读者感觉到,所谓“动荡”表面上指战争本身的动荡,实际上还暗含雅典人和伯罗奔半岛人政治情绪的动荡,以及如此情绪被战争激发到极端状况的过程。可以说,修昔底德虽然是在记叙一个历时三十年的事件,但他的眼界和心志似乎要与哲人的视界比高低。反过来看,如果我们按如今的史学习习惯把修昔底德称为所谓史学家,就难免用我们的眼界看低修昔底德——本书初版时的书名为 *Man in his Pride: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ucydides and Plato*,可见本书作者没把修昔底德视为史学家,而是视为“政治哲人”与柏拉图对观。

柏拉图对于我们来说同样耳熟却未必能详。我们都知道柏拉图是大哲人,但我们往往忽视柏拉图首先是纪事作家,而且主要以一个人的纪事——苏格拉底纪事为中心。柏拉图的哲学几乎无不呈现为纪事的形式,这使得我们必须考虑柏拉图哲学的品质。不仅如此,柏拉图还以文学书简形式提供了关于自己的纪事。在柏拉图的传世作品中,虽然这一部分纪事所占篇幅不大,分量却不可谓不重。由于柏拉图在他的苏格拉底纪事中几乎不见踪影,不像修昔底德那样,在自己的战争纪事中以第三人称现身,柏拉图的书简就成了理解他的苏格拉底纪事的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此而言,柏拉

图的书简与他的苏格拉底纪事的关系,的确堪比修昔底德纪事的分身术。

本书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古典学教授,著名古典学家伯纳德特的老师(参见伯格/戴维斯编,《走向古典诗学之路》,肖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作者“并不打算把修昔底德与柏拉图视为各自正统意义上的纪事家与哲人”,而是打算把修昔底德看作哲人,把柏拉图看作纪事作家,而且明显有对观的意图。面对这样的原典研读,如今大学文科的专业意识会感到无所适从,因为我们的史学专业意识不会把修昔底德的《战争志》作为富有哲学思考的经典来研读,我们的哲学专业意识不会去关注柏拉图作品的纪事笔法,我们的文学专业意识则既不会去关注修昔底德的纪事(那是史学专业的的事情),也不会去关注柏拉图的纪事(那是哲学专业的的事情)。本书甚至也会让我们的政治思想史专业意识感到无所适从——重版本书时,作者把书名改为 Greek Political Theory: The Image of Man in Thucydides and Plato,似乎要以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纪事个案来呈现“古希腊政治理论”这个大题目,在我们看来当然是“以偏概全”。但我相信,本书肯定比一般的政治思想史书更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古希腊政治理论”的内在脉动。反过来说,如果不深入经典作品的细节,我们的政治思想史专业意识不可能真正变得“专业”起来。

2011年8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前 言

[v]在此书中,我并不打算把修昔底德与柏拉图视为各自正统意义上的纪事作家与哲人。我的目标毋宁说是建立他们的智识结构,也就是为他们各自建立一个完整鲜活的、个体的智识个性。一个人的学说有其自己的生命;它们应属于历史秩序和逻辑秩序,因为[人们]在时间进程和逻辑可能性的范围中探究这些学说的其他解释可能。但他的学说之整全却是另一回事。一个人的性情已经整合了他的诸种学说,以致一个完整的智识画面只能是一种这样的图像,它意味着对于他的思想的独特方面来说,别的选择是不可能的。

这两位作家的肖像构成了这本小书的一个要素。我还试图把公元前五世纪的世界(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生活在其中)展现在我们面前,但不是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因为谁也无法做到比修昔底德《战争志》和柏拉图对话更为直接地再现那个世界——而是在艺术家及其作品各安其位的意义上使那个世界鲜活起来。我并非打算说我认为公元前五世纪像什么样子,也不是重述修昔底德和柏拉图说它像什么样子,而是展示另一种画面,在其中,纪事作家及其历史素材和哲人及其复杂且裸露的世界,都是一个完整画面的诸多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人类社会的意义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会比在任何其他时空更加完整。

我确信,这一时代对于我们的意义比起位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任何历史时期的意义都更为重要。一个清楚而又常被提及的事实是,那个时代就像我们时代一样是“一个充满

道德危机的时期”，传统伦理那时已经成为许多人头脑中怀疑和否认的对象。[vi]事实不惟是，我们时代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正经受着公众压力而行事，并以诸多方式大规模地相似于雅典的直接民主制；也不仅是那个时期如同我们的时代一样爆发了整体战争(total war)，而且[两个时代]不论在和平还是战争中，日益增长的关于权力操作的技术化观念也如出一辙。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人性，它使我们如此贴近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当然，这种人性不是仁慈(humaneness)意义上的人性——因为他们和我们都得在不同的情境中面对人类极端的残酷——而是这种意义上的人性：正是人且只是人，不被天道或超自然所制裁，是冲突的根源及解决的途径。

然而，既然我们与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政治生活具有如此显著的亲缘性，为什么只选择这两位为我们记叙了雅典政治生活的人，而不讨论那些贯穿希腊政治理论的普遍概念？我对于自己选择的很不正统的方法，有两个好的理由。首先，正是这两位作家以逼真和贴切的形式向我们呈现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政治[情境]。除了辅助性的二流作家，如色诺芬、老寡头^①(the Old Oligarch)和戏剧家(他们的政治见闻相对次要)，还有另外两位人们推重的相关作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但是，希罗多德是在波斯

① [译注] 在公元前431年到前420年之间，某位雅典人撰写了一本批评雅典民主的小册子，名为《雅典政制》。它是已知最早的评论雅典民主制度的文章。长期以来，这部作品被归于色诺芬名下，近代古典学家利用历史—实证、文体学等方法判定其并非色诺芬的真作。因此在本书的一些章节中，格雷纳用“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称呼这部作品。由于该作品站在寡头派的政治立场抨击雅典民主制，现代学者又用“老寡头”一名称呼此文的作者，值得提醒的是，“老寡头”并不代表作者写作时年龄很大，“老”，更多地是标识其较为顽固的政治立场。

战争的爱国热情的余晖下写作的,希腊当时为了捍卫自由而抵御东方帝王的专制统治。那时的道德氛围是为着一种好像是短短几年里的自我辩白(*self - vindicated*)和稳固伦理的东西而欢呼——那个世界与伯罗奔半岛战争时期的雅典相隔甚远。而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thics*)和《政治学》(*Politics*)与伯利克勒斯的雅典也相去甚远;那是雅典文明历经亚里士多德所编录的胜利与危机后留下的文化残骸。

然而,这种相当呆板的理由并非选择这两位作家以及像我所做的这样探讨他们的首要原因。[vii]政治观念不会成为脱离现实之物(*grow disembodied*),而且只有在它们的发展中,在它们鲜活的发生状态中——无论怎样我们必须间接地重获这个发生状态——我们才能理解它们。在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与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人之间政治的相似和差异的研究中,紧要的东西与其说是对原则的考虑,不如说是一种关于人和境遇的知识以及处于境遇中的人。我们从理解他们所得到的就像从理解我们同时代人所得到的——一样多。尽管这种知识可能由于它的遥远距离而变得更加丰富,可是无论我们怎样间接地获得这种知识,它必须是面对面的知识——本质上就像一个人对一位朋友的理解。

此外,不单是我们对个人的鲜活整体的尊重促使我们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待其自身——防止对他们两人作一种轻率和随意的整合或比较——再说,我们必须处理的材料正处在无法化约(*irreducible*)的大相径庭的两种状况中。这不是因为一位是纪事作家,另一位是哲人,而是因为一位给我们留下一部著作,尽管某些章节未经修订,它却呈现出一幅历史画布的完整风貌;另一位则留给我们一系列作品,正如我想表明,在其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形式体系的连贯表达,但

可以找到一个人臻至成熟渐入晚年的发展历程,以及他所表露的独特洞察。因此,鉴于论证材料、文本结构等问题,我们这两位作家的肖像必定迥然不同。

然而,一旦我们由他们各自的整体中察见其整全,我们也许可以获得某种有关限度的启发——根据政治人的看法,我们西方传统已在这个限度内得到了发展。这位纪事作家和这位哲人的眼睛都专注于同一个历史社会。就他们所观察的东西而言,他们俩脾性的差异至关重要。他们智识结构的两极性界定了一种范围,据我判断,西方的所有政治思考都可以看作是在这种范围内活动。修昔底德和柏拉图所始料不及的诸多关于政治社会中的人的理论已经出现了,[viii]但以历史的和哲学的这两种不同方式所获得的人论之整全是一种始和终(alpha and omega)。

于是,在研究修昔底德和柏拉图时,这种智识个性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与那个使他们疏远我们的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保持一致,因为他们各自都特别适合且可能无与伦比地适合作为希腊和我们之间的中介。他们既不完全是自己国家的公民,也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他们自觉地站在一种居间(in-between)关系中,担当思想进程中的人类启明(human illumination),没有那种陷入到跟一个特殊时期保持彻底的历史一致的太人性(too-human)的局限。

正是偶然和幸运把修昔底德从实践政治(practical politics)中抽离了出来。而赋予他力量去描述一个其时代的邦国几乎被破毁得面目全非的世界,却不是偶然或幸运。综观他的一生,对于那个委派给他的相对次要的实际(军事)任务的失败感,以及他随后从任何一场被他视为其时代最大政治竞争的政治战斗中的脱离,的确加深了他内心的历史孤独感,而且也许使他以更大决心,朝着那个未知的未来世界去言说

那些只能从智识上得以绘制的[历史]侧面。

基于其他原因,柏拉图在面对自己的时代时,也发现自身处于类似的困境。他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被某个人类社会施以魅惑(enchanted),当他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时,这个社会就在三十僭主的统治下坏死和终结了。正是借助这个被再造为他的梦幻生命的昨日世界,柏拉图才得以活在我们之中。这一世界就是他留给“那些应该追随其足迹的人”的不朽部分,那些人则置身他在《王制》(*Republic*)中所称的“某些超离我们知识的蛮荒之地”。

致 谢

该书是在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支持下,数年来讲授修昔底德和柏拉图课程的结晶。感谢我的各班学生,我与他们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我尤其感谢我从前的一位学生,奥斯特沃德(Martin Ostwald)先生,他深入细致地编辑了手稿中有关修昔底德的部分。感谢委员会及其主席内夫(John U. Nef)教授,使我有幸并能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从事这项研究,我认为这在当今任何大学都无法再现。

大卫·格雷纳

芝加哥大学

1949 年 12 月

目 录

中译本说明/刘小枫	(1)
前言	(1)
致谢	(1)
第一部分 旁观者	(1)
第一章 修昔底德的世界	(2)
第二章 我们所知的修昔底德	(14)
第三章 修昔底德政治的难题	(26)
第四章 修昔底德与雅典民主制	(39)
第五章 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	(49)
第六章 历史必然性	(65)
第七章 偶然和怜悯	(81)
第八章 超越必然性	(92)
第二部分 尘暴中的人	(107)
第九章 言辞与行动	(108)
第十章 御者与团队	(150)
第十一章 建构	(176)
第十二章 西西里的尝试	(198)
第十三章 通往朝圣之路	(212)